

学林

◀ (上接9版)

博识前朝掌故”。说他为了保存敬一亭中的“大内档案”，颇为担忧，生怕被盜被烧(见《而已集》所载《谈所谓“大内档案”》)。鲁迅写此文时，胡玉缙已经离开了博物馆。

其实，对于这批档案，胡玉缙是出过力的。

据1922年7月1日的《北京大学月刊》第三版，载有当时胡玉缙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一封信。因为档案移归北京大学的研究所，所以他写信谈档案的整理保护。信中谈到了自己在任中，曾和馆员一起，打开装档案的麻袋，其中文书“多所霉烂”“尘秽不堪，着手不易”。并“商之社会司长夏穗卿(夏曾佑)”。因该档案移交到北大“研究所”，因此提出希望按如下步骤整理：1.曲者铺平掖直，断者接好。2.按朝代年月日成束，分列插架排列。3.然后由学者编撰整理。

当时，胡玉缙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。在一个世纪前，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0岁前后的时代，一个照现在来说已过退休年龄的国家博物馆负责人，和属下的馆员一起搬弄书库中的旧麻袋，翻找整理霉烂旧档案。我想，很难说胡玉缙在任上只是袖手旁观，失职放任吧？

胡玉缙从博物馆离开，转任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。这或许和1916年以后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也有点关系。

同时，他因曾在清政府的京师大学堂任教，和清朝当时有影响的学界元老，柯劭忞、江瀚、王树枏、卢弼、夏孙桐、邵章、孙雄等多有交往。总之，在民国初期的北京学界，胡玉缙是位有知名度的学者。

胡玉缙的难能可贵之处，在于他并没有因此而满足，固步自封；或忙于应酬，成为“专职”的社会名流，而是持之以恒，在学术领域跋涉耕耘。

三

1925年前后，国内和日本的一些学者重提清末学界的旧案，编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时，胡玉缙参与其事。

说到对《四库全书》的补充、考证和研究，也就是后世所说的“四库学”，其实早在18世纪末叶，清朝嘉庆时期就已见端倪。

嘉庆四年(1799)，阮元任浙江巡抚，发现有不少《四库全

书》未收之书，于是就注意收罗，后来选其中的宋元善本、名钞进献朝廷，这就是现存的《宛委别藏》。又编有《四库未收书提要》(即《笈经室外集》)。此后，多有人对《四库总目提要》或《简明目录》进行了补充和考辨，如邵懿辰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。清末的陆心源家中收了很多书，也有此愿，并且撰写了《正纪》二卷，但是在清朝官场上跌过跟头的俞曲园，曾劝其慎重。对此已经有不少专论，不赘。

胡玉缙先生在光绪末年(戊申,1908年)，也曾建言续修《四库提要》，未有结果(见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1250页)。辛亥鼎革之后，“顾忌斯解”，他始得放手从事此事。“用数十年之力，为之补正”(见王欣夫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1228页)。所以，1925年，中国和日本学界有编撰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之事，他参与其中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了(关于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的编修过程和中日双方参与者的具体情况，笔者已有专文叙说，见拙文《关于撰修〈续修四库总目提要稿〉的人和事》，载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办的《国际汉学研究通讯》第6期，179-193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2年。又见复旦大学历史系、出版博物馆、中华书局、上海辞书出版社编《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》，539-552页，2013年)。

根据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日本方面的实际负责人桥川时雄的记述，胡玉缙在该书的编纂过程中，做了很大的贡献，表现在三个方面：

其一，最初发凡起例、确定编写方案的实际主事者，就是胡玉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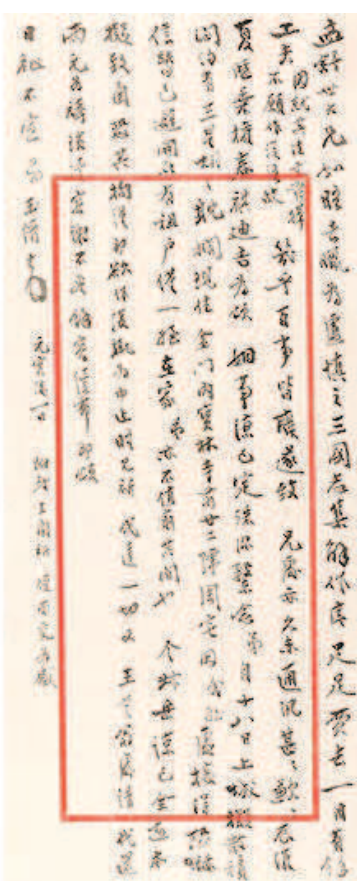
其二，在最早参与此事的学者中，他出力最多，在编纂者中，所处的地位、享受的待遇是最高级别的。据桥川说：

在最初，中国方面参与这件事、在运作中所处地位最高的有三人：柯劭忞、胡玉缙、江瀚。他们月薪每月100元以外，著录提要一篇稿费30银圆，存目提要一篇20银圆。稍后的明伦、杨钟羲等，没有月薪，稿费也同此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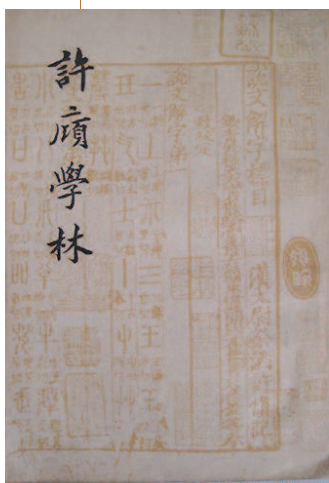
在编修中，胡玉缙主要参加了经部和子部的工作，主要撰写有关“礼学”尤其《周礼》那部分。

其三，面对初期进展甚慢的状况，是胡玉缙首先提出要进行改革，改变方法，采取稿件和报酬挂钩的方法，才促进了事业的实际开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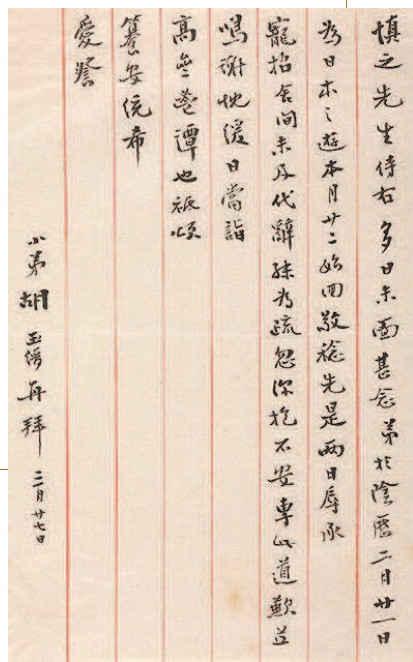
桥川说：1931—1932年间，“《续修四库全书目录》的做



胡玉缙致汪孟舒书札
均资料图片



《许頔学林》书影



胡玉缙致卢弼书札

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，重新改造了研究体制，实际上，这是胡玉缙首先提出来的。”他提出：“像现在这样做下去的话，工作永远也完成不了。只是拿干薪，真感到可耻。”(见《桥川时雄的诗文和回忆》309页，东京，汲古书院，2006年)于是改变方法，采取取消月薪，把稿件和报酬挂钩的方法，促进了事业的开展。否则，现在未完全完成的这部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不知会成何模样。

后来有学者问起当初的情况，桥川认为，只有胡玉缙是确实的学者，目录版本专家，他起的作用最大。这虽然是桥川一人的见解，但胡玉缙的作用，当可想知。

我想，编修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的最初意向，或许和他正在撰写的《补证》有关，而

且他是少数真心为此项目出力作而不仅仅是为稻粱谋的人。在1931年以后，中日关系日见紧迫。有的学者表示，自己参加这项工作，不无“稻粱谋”的动机。但是，据桥川说：胡玉缙等二三人，认为不费力气写的东西，“不要稿费”，提供了不少稿件(上引《桥川时雄的诗文和回忆》310-314页)。

胡玉缙在1931年，曾再次东渡日本。居于当时的驻日公使馆，和公使汪荣宝论学。关于第二次赴日的时间，《法言义疏叙》称在“辛未夏，余再渡东游”(见《许頔学林》273页)，考“辛未”为1931年。汪荣宝归国后，曾拟编有关《说文》之书，开列书单，胡玉缙为其采购数百种，活跃在学界。

关于这一时期胡先生的研究，国内学者如何评价呢？

记得以前翻阅金庸主编的香港《明报》月刊，其中载有牟润孙先生写的《学兼汉宋的余季豫先生》，写到：“蓼园先师尝说：‘我的两个门人中有两人致力于《四库提要》。’一是胡玉缙(绥之)，另一人就是季豫先生(余嘉锡先生)。”牟润孙赞扬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之精密宏博，而余先生先说：“不然。我的经学功夫不足。”这大概是有所指的吧(《明报》月刊1986年三月号，53-56页)。

这里的“蓼园”，乃是柯劭忞(1848—1933)，为民国年间清史馆的负责人。余嘉锡在1928年前后进清史馆，牟润孙是1931年进清史馆从柯劭忞学的(见《被隐蔽的新亚学人》，《东方早报》引用日期2015-